

· 本书编辑委员会 编

中国人文社会科学 博士硕士文库

· 续编 ·

文学卷

(上)



浙江教育出版社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中国人文社会科学 博士硕士学位论文文库

文学卷

(上)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中国人文社会科学 博士硕士文库

· 续编 ·

文学卷

(上)



浙江教育出版社



本书列入
国家“十五”重点图书出版规划

编辑说明

《中国人文社会科学博士硕士文库》(续编)系国家“十五”重点图书规划项目,所收论文大都具有比较重大的学术创见和理论意义。

首辑文库 1998 年出版后,受到学界的广泛注意和较好评价。不仅专门研究者将其视为不可或缺的学术信息和参考资料,广大参加自学考试的人们更将其作为撰写论文的范本,收集材料、形成观点的路径。初版千套,两月内即告售罄,可见社会有此需要,因此便有编辑出版续集的计划。

本书主要收集 1994—2000 年在我国高校和科研机构毕业并获得博士、硕士学位者的人文社会科学优秀学位论文,并适当兼顾 1994 年前相关之优秀学位论文,凡 150 篇。全书分文学、历史学、哲学、经济学、法学、教育学六大学科卷,共 17 分册。为了便于读者阅读和学术交流,对于入选学位论文,我们均请作者进行了精心的修改或必要的调整,有关情况详见各篇题注。

我们是立足于高度负责的学术立场、本着极其认真的学术精神,来从事本书的组织与编纂工作的。为了切实保

障本书独一无二的学术品质,仍特邀德高望重的于光远教授、季羨林教授、蔡尚思教授担任名誉总主编。王元化教授、任继愈教授等学界前辈任学术顾问。纪宝成教授、陈平原教授等知名中年专家任学术编委。

在本书学术顾问、学术编委的热情指导和学术界广大专家学者的大力支持下,经过作者自荐、专家推荐、权威遴选等多种形式,本书即将隆重奉献给学术界、教育界和读书界。本书之顺利编纂和出版,将不仅有利于系统地反映我国学位与研究生教育的辉煌成就,而且还有利于从一个基本的层面及时总结我国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研究的基础性、理论性、前沿性和创新性学术成果。有一点需要说明的是,一些远在海外或者由于别的原因未能联系上的作者,虽其论文颇具社会影响,在学界评价甚高,然无法收录,不免有遗珠之憾。

我们有充分的理由相信,与已经出版的《中国人文社会科学博士硕士文库》一样,本书将成为全面反映我国研究生与学位教育方面最新成就、最权威的标志性成果之一。

我们热切期待着专家学者和广大读者的批评、关心与厚爱!

本书编辑委员会

2004年9月

目 录

上册

以意逆志论——中国古代文学批评方法研究之一 …	张伯伟(1)
从《九歌》到《离骚》——楚辞与原始宗教研究之一 …	过常宝(101)
舜孝故事的历史演进与伦理观照	陈泳超(169)
魏晋文学地理论纲	胡阿祥(209)
《昭明文选》研究	傅 刚(248)
大历诗风	蒋 寅(312)
关于北宋党争与文学的两个问题	沈松勤(367)
论《江湖集》的历史真相——兼论它在江湖派研究中的意义	费君清(434)
佛教与晚明文学思潮	黄卓越(496)
论李贽的文学思想	左东岭(566)

中册

中国小说评点研究	谭 帆(633)
新文学的建立与现代书写语言的产生	王 风(705)
超越雅俗——抗战时期的通俗小说	孔庆东(752)
想像的代价——20 世纪 90 年代中国小说研究	黄发有(812)
盲视与洞见——中国后现代批评的回顾和反思	陈伟军(883)
否定主义美学的基本原理	吴 炫(908)

- 中国美术现代化导论 郑 工(974)
- 钱穆与甲骨文及考古学 傅 杰(1060)
- 古汉字形声结构论 黄德宽(1124)

下册

- 论上古汉语同源词的“义通” 黄易青(1213)
- 元代白话碑文的直译体特征 祖生利(1295)
- 试论敦煌俗字研究的意义 张涌泉(1403)
- 面向中文信息处理的现代汉语短语结构规则研究
..... 詹卫东(1473)
- 跨文化语篇之标记性——对中国英语学生语篇标记性的研究 ...
..... 陈建平(1554)
- 马勒的第三交响曲与马勒的维也纳时代 李秀军(1654)
- 阿尔班·贝尔格的生活与创作道路 余志刚(1766)
- 广播电视媒介管理创新体系模式研究 胡正荣(1812)

以意逆志论*

——中国古代文学批评方法研究之一

张伯伟

一、从儒家人性论看孟子“以意逆志”的提出

(一) 孟子的人性论及其特色

“以意逆志”说提出的哲学基础,是以孟子为代表的儒家人性论。人,按照《说文解字》的讲法,乃“天地之性最可贵者也”^[1]。这无疑是从儒家而来。《孝经·圣治章》引孔子曰:“天地之性,人为贵。”^[2]《礼记·礼运篇》也说:“故人者,其天地之德,阴阳之交,鬼神之会,五行之秀气也。”^[3]人性何以最为可贵?郑玄说:“贵其异于万物者也。”^[4]这个最具有人性的光辉而又与万物相异的一点,在孔子看来,就是根植于人生命内部的“仁”^[5]。仁的实现,是通过“忠恕”而达到的。曾子以孔子的一贯之道为“忠恕而已矣”(《论语·里仁》),就是抓住了其思想的核心。朱熹注曰:“尽己之谓忠,推己之谓

* 本文选自作者博士学位论文《中国古代文学批评方法研究》第一章(导师为程千帆教授、周勋初教授)。全文共40万字,收入本书之前,曾由作者加以修订。

恕。”^[6]其《中庸章句》又曰:“尽己之心为忠,推己及人为恕。”^[7]朱熹的解释使得孔子隐而未彰的思想显发凸现出来,而在先秦孔门后学中,首先将孔子的人性论作进一步发挥,从而落实到“心”与“推”二字上的是孟子。也正是在这两个方面的拓展,从而形成了孟子的人性论及其特色,并且奠定了他在儒家人性论发展中的地位。

我们不妨作一个简单的统计,“仁”字在《论语》中出现了 107 次,在《孟子》中出现了 153 次;“心”字在《论语》中出现了 6 次,在《孟子》中出现了 122 次。从这个数字对比中不难发现,孟子对“心”的重要性是何等重视与强调。

“仁”字的古义为千心相通^[8]。但这一点,直到孟子才明白指出。孟子说:“人之所以异于禽兽者几希,庶民去之,君子存之。舜明于庶物,察于人伦,由仁义行,非行仁义也。”(《孟子·离娄下》)在孟子看来,人与动物相同者众多,而相异者“几希”,不过,正是这个“几希”之处才使人之所以成为人。照孟子的观点,这就是“仁义”。这个“仁义”是根植于人内在生命中的(“由仁义行”),而不是可由外铄的异己的他物(“非行仁义也”)。所以,孟子又说:“仁也者,人也。”(《尽心下》)把“仁”作为人的本质加以规定和确认。但是,这还不是孟子的发明,因为《中庸》也曾引用孔子的话说:“仁者人也。”孟子的孤明先发之处在于他进一步说:“仁,人心也。”(《告子上》)又说:“仁义礼智根于心。”(《尽心上》)这样一来,就把《论语》中子贡所“不可得而闻”的“性与天道”(《公冶长》),以及《中庸》里讲的“天命之谓性”完全落实到人的“心”上,这也就是把道德的根源、行为的主宰落实到人的“心”上,使人们认清人的本质不在于宗教,不在于玄学,而在于人自身^[9]。

综合孟子的言论,这位哲人对于人性,也就是“心”的种种分析从逻辑上似可分为四层:

其一,人皆有心。在孟子看来,“心”不仅是一个生理上的存

在,更是一种道德精神的主体。这种道德精神是人人皆有,而且是本来就存在于人的生命之中的。《孟子·告子上》指出:

恻隐之心,人皆有之;羞恶之心,人皆有之;恭敬之心,人皆有之;是非之心,人皆有之。恻隐之心,仁也;羞恶之心,义也;恭敬之心,礼也;是非之心,智也。仁、义、礼、智,非由外铄我也,我固有之也。弗思耳矣。^[10]

由此而加以发展、建立起来的人性论,就是一种性善论^[11]。孟子反复强调这一点,说“人皆有不忍人之心”(《公孙丑上》),又说:“心之所同然者何也?谓理也、义也。圣人先得我心之所同然耳。故理义之悦我心,犹刍豢之悦我口。”(《告子上》)正因为人人皆有此心,圣人也不过是“先得我心之所同然”,故“人皆可以为尧舜”(《告子下》)。但是,在现实生活中,除了善,还有恶;除了君子,还有小人。这又是从何而来的呢?于是,就更推进到第二层次的分析。

其二,失却本心。恶从何来?就孟子的观点来说,是由于“失其本心”(《告子上》)。“本心”就是仁、义、礼、智之心。君子和小人的差别,贤与不肖的差别,全在于是否能保得此心。孟子一再地说:“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离娄下》)^[12]“赤子之心”也就是人的“本心”。

君子所以异于人者,以其存心也。君子以仁存心,以礼存心。仁者爱人,有礼者敬人。(《离娄下》)^[13]非独贤者有是心也,人皆有之。贤者能勿丧耳。(《告子上》)^[14]

“本心”就是“不学而能”的“良能”和“不而知”的“良知”。一般的人,往往为欲望(利)所驱使,从而“放其良心”(《告子上》),使其“本心”遭到蔽障与吞没。孟子自认为能做到“四十不动心”(《公孙丑上》),也正因为保持了其“本心”。所以,孟子所说的“心”,也就一定是善的。宋儒发挥孟子的义理,认为“心兼善恶”^[15]而言,似与孟子原意不合。既然有的人失却了“本心”,在孟子就称作“放心”。于是,就进入了第三层次的分析。

其三,求其放心。孟子说:“仁,人心也;义,人路也。舍其路而弗由,放其心而不知求,哀哉!”(《告子上》)那么,如何才能求得“放心”呢?孟子指出两点:其一,从学问中。他说:“学问之道无他,求其放心而已矣。”(《告子上》)其二,从行为上。他说:“舜之居深山之中,与木石居,与鹿豕游,其所以异于深山之野人者几希。及其闻一善言,见一善行,若决江河,沛然莫之能御也。”(《尽心上》)荀子言“性恶”,但在强调“学”的方面,与孟子一致。这实际上是得自孔门之传。孔子说:“三人行,必有我师焉。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改之。”(《论语·述而》)子夏说:“事父母能竭其力,事君能致其身,与朋友交,言而有信。虽曰未学,吾必谓之学矣。”(《学而》)这是指行为上的“学”;而孔子说:“不学《诗》,无以言。……不学礼,无以立。”(《季氏》)又说:“小子何莫学夫《诗》?”(《阳货》)则是指书本上的“学”。“学”的目的,在于立志、求道。所以子夏说:“博学而笃志,切问而近思,仁在其中矣。”(《子张》)又说:“君子学以致其道。”(同上)孟子思想与此是一脉相承的。求其放心,限于一己,这是不够的,更应该扩而充之。所以,还有最后一个层次,即——

其四,推扩此心。《论语》中无“推”字,但是在求知方面,孔子也强调由已知推导出未知。所以,他一再地说:“温故而知新,可以为师矣”(《为政》),“告诸往而知来者”(《学而》)以及“回也闻一而知十,赐也闻一以知二”(《公冶长》)。孟子始明确提出“推”的概念,与此相关的,还有“扩”、“充”等概念。孟子说:

无恻隐之心,非人也;无羞恶之心,非人也;无辞让之心,非人也;无是非之心,非人也。恻隐之心,仁之端也;羞恶之心,义之端也;辞让之心,礼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凡有四端于我者,知皆扩而充之矣。若火之始然,泉之始达。苟能充之,足以保四海;苟不充之,不足以事父母。(《孟子·公孙丑上》)^[16]

在《梁惠王上》有一段与此大意类似的话:

《诗》云：“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言举斯心加诸彼而已。故推恩足以保四海，不推恩无以保妻子。古之人所以大过人者无他焉，善推其所为而已矣。^[17]

又说：

推恶恶之心，思与乡人立。（《公孙丑上》）^[18]

又说：

人能充无欲害人之心，而仁不可胜用也；人能充无穿踰之心，而义不可胜用也。（《尽心下》）^[19]

这种推扩的作用，如果运用于政治，便是“德治”与“仁政”；如果运用于修身，便是“知人”与“尚友”。而作为其基础的，就是人人皆有此“心”，所以能够冲破时空的限制而彼此相通。这一点，似可与庄子学派作一比较。在认知方法上，庄子所采取的是直观静察，而不是逻辑推理。《庄子·秋水》篇所记载的著名的濠上观鱼的对话就是一例。庄子曰：“儵鱼出游从容，是鱼之乐也。”这是一种审美判断，出之于直观。惠子曰：“子非鱼，安知鱼之乐？”则是以一种逻辑推理加以是非判断。徐复观分析道，庄子的判断“是美的观照中的直观、洞察”，鱼之乐“是在濠上的美底观照中，当下呈现的；这里安设不下理智、思辨的活动。所以也不能作因果性的追问”^[20]。这也就是庄子所说的“知其不可得也而强之，又一惑也，故莫若释之而不推”（《天地》）。因此，在庄子就拈出了一个“止”字诀，并反复加以说明：

故知止其所不知，至矣。（《齐物论》）^[21]

自以为不通乎命，故止也。（《至乐》）^[22]

知止乎其所不能知，至矣。（《庚桑楚》）^[23]

故德总乎道之所一，而言休乎知之所不知。（《徐无鬼》）^[24]

无论是人心、知识，庄学认为于其不知或不能知者均不可以“推”，而只能够“止”，与孟子所讲恰恰相反。这是一项十分重要的

分野。

孟子对“心”的强调和落实,宋儒早已发现,并在此基础上发展出“心学”。陆九渊说自己的思想是“因读《孟子》而自得之”^[25],所以,他认为虽然历史变迁,王朝兴衰,但人类千古之心却是相同相通、永不磨灭的。“墟墓兴衰宗庙钦,斯人千古不磨心。”^[26]他又说:“孟子云:‘尽其心者知其性,知其性者知天矣。’心只是一个心,某之心,吾友之心,上而千百载圣贤之心,下而千百载复而一圣贤,其心亦只如此。心之体甚大,若能尽我之心,便与天同。”^[27]对孟子的人性论作了进一步的阐释与发挥。

朱熹也曾指出:“学问之道无它,求其放心而已。”又曰:“有是四端于我者,知皆扩而充之。孟子说得最好。人之一心,在外者又要收入来,在内者又要推出去。《孟子》一部书皆是此意。”^[28]

朱熹又说:“《论语》一书未尝说一心字。至孟子,只管拈人心字说来说去:曰推是心,曰求放心,曰尽心,曰赤子之心,曰存心。莫是孔门学者自理会个心,故不待圣人苦口;到孟子时,世变既远,人才渐渐不如古,故孟子极力与言,要他从本原处理会否?”曰:“孔门虽不曾说心,然答弟子问仁处,非理会心而何?仁即心也,但当时不说个心字耳。”^[29]

由此可见,孟子以“心”字发展孔子的“仁”字,从而形成其人性论的特色,不仅是一项不可否认的事实,而且这一事实,也是古今所共认的。

(二) 儒家人性论在修身治学方面的伸衍

从儒家人性论所含蕴的意义来讲,一旦在修身、治学方面伸衍展开,就必然会导致“以意逆志”与“知人论世”之说的产生。由修身而导致的“知人论世”,和由治学而导致的“以意逆志”,如果推到极致,二者实际上是会通为一的。因为治学的目的还是在于修身,即孔门所强调的“为己之学”。^[30]所以,这两段话虽然是在不同的场合下说出,但在孟子的思想结构中,彼此实密切相关,其内在精

神与理路是贯通一致的。^[31]

先就修身方面来说。《中庸》引述了孔子的一段话,虽然不能肯定为孔子所说,但作为儒家人性论在修身方面的原则是颇具代表性的:

故君子不可以不修身;思修身,不可以不事亲;思事亲,不可以不知人;思知人,不可以不知天。^[32]

可见,在这一逻辑结构中,由“修身”必然会导出“知人”。孔子的人性论以“仁”为基础和特色,他认为,“仁”的精神,必定是个人与他人息息相关的精神。所以说:“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论语·雍也》)但是,要做到“立人”、“达人”,首先必须“知人”。所以他又说:“不患人之不己知,患不知人也。”(《学而》)但“知人”的前提是“知言”,所以他又说:“不知言,无以知人也。”(《尧曰》)作为儒家人性论在实际运用中的重要环节是“知人”;就“知人”的动机和目的而言,是为了达到“仁”,而就“知人”的最初步骤来讲,则是“知言”,由“知言”可以进而“知心”,由“知心”再上一关,便达到“知人”。但儒家讲的“知人”,不仅仅局限于当代并世之人,他们是把古人、今人包括在一起而言的。而要了解古人,则主要通过阅读古代流传下来的典籍以达到。《尸子》引孔子语曰:“诵诗读书,与古人居;读诗诵书,与古人谋。”(《意林》卷1引)这两句话,在《金楼子·自序篇》中引作“曾生所谓‘诵诗读书与古人居,读书诵诗与古人期’”。究竟是孔子还是曾子说了这两句话,当然不易确考,但可以肯定是孔门遗说^[33]。居即居处,谋即谋面,期即期会,所谓“与古人居”、“与古人谋”或“与古人期”,用现在的话来说,也就是与古人精神相照、心灵相通。人心虽历千载百年而仍然能相通,自然是由于“此心”是“人皆有之”的缘故。从修身的目的出发,儒家重视知人,重视交友,在这样的环境中养成自己的仁德之心。曾子说:“君子以文会友,以友辅仁。”(《论语·颜渊》)孟子说:“友也者,友其德也。”(《孟子·万章下》)不仅如此,孟子还对这一问

题作了较为全面的论述。《万章下》云：

一乡之善士，斯友一乡之善士；一国之善士，斯友一国之善士；天下之善士，斯友天下之善士。以友天下之善士为未足，又尚论古之人。颂其诗，读其书，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论其世也，是尚友也。^[34]

当“尚友”的范围扩大到古人时，便发生了“颂诗”、“读书”的问题了^[35]。要知古人，只有“颂诗”“读书”，但要真正理解“诗”“书”，还必须“知人”。从孟子的人性论来看，他的最高目标是要推扩此心，如上文所说，当这种推扩作用于修身时，就必然会导致“知人”和“尚友”。

其次，再就治学方面来说。《论语·学而》中孔子的第一句话是：“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朱熹的注解正是从人性论上加以发挥的。他说：“学之为言敦也。人性皆善，而觉有先后。后觉者必敦先觉之所为，乃可以明善而复其初也。”（《论语集注》卷1）学的方法是“效”，而学的目的是“明善而复其初”。所谓“复其初”，即孔子所说“性相近”的“性”^[36]，或者是孟子讲的“本心”。由这样的学习方法和学习目的也就决定了与之相适应的学习内容。从《论语》中可知，孔门的教材主要是《诗》、《书》、礼、乐。在《论语》中，孔子引《书》以教门人弟子的有两处，引《诗》有19处，由《诗》而兼及礼者有六处，而提到音乐的就更多了。《诗》、礼、乐的关系，在孔子看来是“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论语·泰伯》）。所以，《史记·孔子世家》上说“孔子以《诗》、《书》、礼、乐教”。但是，作为一个伟大的文化传播者与发扬者，孔子在学的内容、方法及目的上，一方面继承了西周官学的传统，另一方面，又在其人性论的过滤之下，显示出新的色彩。

《礼记·学记》记载：“古之教者，家有塾，党有庠，术有序，国有学。”^[37]其教学内容根据《王制》记载：“乐正崇四术，立四教，顺先王《诗》、《书》、礼、乐以造士。春秋教以礼、乐，冬夏教以《诗》、

《书》。”我们看《左传》记载的当时贵族阶层在宴享或揖让之际赋诗言志,其运用程度之熟练与巧妙,正表明了他们的训练有素。所以,孔子“以《诗》、《书》、礼、乐教”,正是继承了周代的王官之学。而《诗》与乐对于个人的修身来说,一个是开端(“兴于《诗》”),一个是完成(“成于乐”),孔子尤其重视。因此,儒家人性论在“学”的方面的展开,也就尤其突出地贯彻、渗透于《诗》与乐的教育和学习上。如果要用一个字加以表达的话,那就是对“志”的强调与追寻。在这一点上,孔子主要是实践上的身体力行,而孟子则主要是理论上的概括总结。《史记·孔子世家》有这样一段记载:

孔子学鼓琴师襄子,十日不进。师襄子曰:“可以益矣。”孔子曰:“丘已习其曲矣,未得其数也。”有间,曰:“已习其数,可以益矣。”孔子曰:“丘未得其志也。”有间,曰:“已习其志,可以益矣。”孔子曰:“丘未得其为人也。”有间,有所穆然深思焉,有所怡然高望而远志焉。曰:“丘得其为人。黯然而黑,几然而长,眼如望羊,如王四国,非文王其谁能为此也!”师襄子辟席再拜,曰:“师盖云《文王操》也。”^[38]

这段记载,还见于《韩诗外传》卷5及《淮南子·主术篇》,《孔子家语·辨乐解》亦用之。《韩诗外传》较《史记》多出下列一段文字:

故孔子持文王之声,知文王之为人。师襄子曰:“敢问何以知其文王之操也?”孔子曰:“然。夫仁者好韦,和者好粉,智者好弹,有殷勤之意者好丽。丘是以知文王之操也。”传曰:闻其末而达其本者,圣也。^[39]

“曲”和“数”,指的是曲调的旋律和演奏的技巧;“志”即心志,指的是音乐中体现出的精神活动;“为人”是指此一精神活动的人格主体。孔子能由“持文王之声知文王之为人”,是因为他确信音乐是人的精神品格(即“仁”、“和”、“智”等)的自然流露,而对于音乐的理解,就贵在将自己的精神沉浸于音乐世界中,与音乐中的“志”融合为一,并由此而达到人格上的效仿(即“学”)与升华(即